

## 摘 要

严歌苓是海外移民作家中的优秀代表，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发表处女作以来，她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严歌苓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她从军、移民、写作编剧等丰富的人生经历带给她的独特体验都在她的创作中得以体现。尤其是当她来到异国他乡后，作为移民者身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她行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和观察。作为一名女性，她本人因错过最佳生育时期而未能亲身体验女性生育的过程，她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体验为其生育叙事奠定了基础，在自己的创作中偏爱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对女性生育问题也予以较多关注。在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严歌苓笔下的生育叙事不仅是对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困境的书写，更是对东方女性丰富的内涵形象的集中阐释，专属东方的文化记忆不断在其创作过程中呈现，做着自己的成长记忆、移民前后所浸润的文化环境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都奠定了严歌苓文学创作的基调，也为本文对其生育叙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

20 世纪初，许多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到记忆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三十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和阿比·瓦博戈（1866-1926，文艺史和文化史学家）提出的“社会记忆”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记忆的相关研究也由此进入到社会性转折阶段。伴随着文化传播媒介和时代研究的变化，更多学者将研究重点从文本研究文本和语境的研究，记忆研究也由此迎来了文化性转向。“文化记忆”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开创性提出，将记忆研究的边界再次拓展至文化学领域，通过对“文化记忆”理论内涵、特征、外延及实践性等诸多概念的确定，将记忆置于文化的三维坐标系下定位研究，建立起记忆、文化和认同三者之间的联系。文化记忆对于民族身份的确认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具有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意义，在传统文化家庭成长起来的严歌苓对于这种文化记忆是深刻且不可复制的，即使移民之后她内心深处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仍要通过笔下那些独具东方特色的人物形象、文化符号等进行表达，在东西两种文化的对立交融下，她将自己记忆中的东方民族进行文学书写，将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现实产生联系，并企图在不断的创作中对自己“边缘者”的身份进行确认。严歌苓作品中对女性的关照，对生育的叙述不仅是文化记忆影响下对移民者对东西方文化的新书写，更是一名处于两种文化边缘的尴尬境界

的移民者对文化、精神原乡的一种频频回望。

本文以严歌苓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切入点，结合作者成长背景及海外移民经历，对作品中与生育叙事相关的生育主体及生育行为进行解读，探讨其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记忆。论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三章内容运用文化学、记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层层深入，以“谁在进行生育记忆、历史记忆的目的、记忆的反思回望”自成逻辑展开论述，构建了不同环境生育体验下参与文化记忆并寻求身份认同的生命场景。第一章聚焦生育体验的主体，即异域女性的生命体验。严歌苓将记忆置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语境中，不论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异国视角的他人的个体记忆，抑或是作为社会交往的群体记忆，都借以具有明显民族文化特性的载体表达，使生育文化的记忆载体和主体都带有独特的民族性。第二章将记忆置于特定历史时期，阐述历史记忆背后所被遮蔽的生育目的和政治权力。作为人类世界自然现象的生育行为，当与其相关的性爱、生育、抚养等行为发生均被外界因素所干扰，其背后的生育伦理与生命形态也将处于一个畸形扭曲的状态。第三章将视线聚焦于记忆和历史的反思，记忆的选择性和个体性的背后是严歌苓作为海外移民作家内心深处对文化和自我的认知，她需要在记忆的反复持续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对历史记忆的叙述中人性和权力进行述和重申中频频回望自己的精神原乡，以确认精神和身份的统一性。

关键词：文化记忆；严歌苓；生育叙事；身份认同

# 目 录

绪 论.....	8
第一章 文化记忆载体：异域女性生命形态.....	18
第一节 独具民族特性的个体记忆.....	18
一 母族文化的延续与魅惑.....	19
二 生育女性的民族文化特质.....	23
第二节 异族生育的交往记忆.....	28
一 交往记忆的主题化：非合法化生育行为.....	29
二 交往记忆的选择性：创伤与遗忘.....	33
第二章 历史记忆书写：生育伦理的颠覆.....	37
第一节 权力导向下的生育行为.....	38
一 男权凝视与情欲释放.....	39
二 记忆偏差与被异化的人格.....	41
第二节 政治规约下的生育现实.....	45
一 性爱与生育的割裂.....	45
二 被遮蔽的生育身份.....	48
第三节 生命价值下的生育伦理.....	51
一 生命的原始命题：野性与顽强的自我形态.....	52
二 生命的终极意义：生育、母性与雌性.....	54
第三章 记忆与历史的重申与反思.....	57
第一节 记忆的自我认知.....	57
一 移民与写作的双重边缘视角.....	58
二 记忆与身份的功能确认.....	60
第二节 历史叙事的回望反思.....	63
一 记忆书写下的人性反思.....	64
二 文学世界中的精神原乡.....	66

结 论.....	71
参考文献.....	72
致 谢.....	77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78

## 绪 论

### 第一节 严歌苓个人经历概述

严歌苓（1958-），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她的祖父严恩春是早期的留学博士，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严敦勋（笔名萧马），母亲俞平是一名舞蹈演员，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严歌苓受到浓厚的学术氛围的熏陶，她在便利的阅读条件下遍览中外名著，不断开拓自己的文学视野，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文字表达能力也由此奠定了基础。少时的严歌苓经历了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阶段的独特记忆以及对复杂人性的初步了解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素材。严歌苓 12 岁时考入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细腻的情感体验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催发着 15 岁的严歌苓懵懂的情感，她因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大 7 岁的军官受到他人的指点和批评，而后严歌苓主动请缨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亲眼目睹了硝烟战火与生死之事后，她将自己的感悟通过诗歌、小说的形式进行表达，在文字的舞台开始初绽光芒，而后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青春》《青年文学》等杂志上崭露头角，严歌苓的处女作《量角器与扑克牌》于 1978 年在《安徽文学》发表，而后成为政治部创作专员的她又发布了多部作品。

1986 年 2 月严歌苓发表第一篇长篇小说《绿血》，学界对其小说的研究也多从这部小说开端。13 年的军旅生活成为严歌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而后陆续发表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7 年）和《雌性的草地》（1989 年）与《绿血》一起并称为“军旅三部曲”。严歌苓在 1986 年邂逅李克威（著名作家李淮之子）并于两年后结婚，结婚当年进入北师大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班学习。因为工作调动，严歌苓与丈夫李克威先后出国，严歌苓进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李克威则远赴澳大利亚。分隔两地的二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最终婚姻短暂的甜蜜被现实打败，两人的婚姻走向失败的结局。海外留学的异地漂泊感以及感情生活的挫败感，让这个独处异乡的女子变得隐忍、坚强起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严歌苓与劳伦斯·沃克相识相恋，劳伦斯因其国务院外交官的特殊工作性质受到监察，而他依旧坚定地选择了严歌苓。1992 年秋天，严歌苓与劳伦斯步入婚姻殿堂，长期处于异乡漂泊状态的严歌苓也终于感受到了温暖，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严歌苓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创作出《红罗裙》（1993 年）《少女小渔》（1993 年）《扶桑》（1996 年）《人寰》（1998 年）《天浴》（1998 年）等优秀作品。作品对女性投以较多关注，在西方价值审美下对东方文明、东方女性重新审视定义，东

方女性两性交往和生育抚养行为中的隐忍品格，在严歌苓笔下与西方文明表现为冲突与对峙，多元文化浸润下的严歌苓聚焦东方女性对民族记忆和文化特性不断进行反思和书写，其文学创作的内容和质量也不断丰富和提升。《穗子物语》（2005年）《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年）《第九个寡妇》（2006）等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改压抑隐忍克制品格而转向强烈自我意识、个性鲜明且明朗乐观的特质，但专属东方女性的宽容善良依旧是人物形象的本色。此后，《小姨多鹤》（2008年）《寄居者》（2008年）《陆犯焉识》（2011年）等作品在主题思想、内容结构、形式技巧等方面愈加成熟，讲故事置于不同历史记忆之下，对政治、历史、权力的反思，对多元化带有独特民族文化特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在诉说着严歌苓多年海外移民生活的独特记忆。

严歌苓作为第五代海外移民，面对所处的地理空间位置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在异国他乡必然面对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种族歧视与不公、生存条件的苛刻与压迫等现实问题。长期海外生活的严歌苓面对异域生活和异质文化也持有复杂情感态度，但她却坚持将目光和笔触置于祖国大地，置于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深处，以更加多元开阔的视角对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进行观察和审视。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论文以严歌苓小说中为研究对象，但在论文框架的构思和实际写作过程中仍需对文化记忆理论、生育叙事、严歌苓小说研究这三大主题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细致具体的梳理，研究现状部分拟围绕这三大主题展开论述，分别为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生育书写研究和严歌苓小说研究。

### 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记忆问题，并在自己的论著中进行研究探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分别在《美诺篇》《论记忆》中提出了“回忆说”和记忆过去属性。中世纪奥古斯丁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提出了“光照说”，而后，洛克、休谟、柏格森等人从生理或心理的角度对记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的“集体记忆”理论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被首次提及，这是记忆问题突破往前生物学、心理学的传统研究，转而社会学方向的重要标志。与其同时期的阿比·瓦尔堡（1866-1926，德国文艺史和文化史学家）认为象征符号与记忆之间延续的关系和必然的关联，意大利复兴时期古典艺术形式的重现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有其特殊含义。“文化记忆”理论是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夫妇在上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是记忆研究向文化维度拓展的重要标志，对记忆、文化二者的跨学科交叉探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记忆”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进入 21 世纪，国内学界也渐趋开始关注文化记忆理论，王霄冰对扬·阿斯曼《论有文字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的译篇，是对文化记忆理论的较早关注。随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文学空间与文化记忆”（2006）“历史与文化记忆”（2007）两场学术研讨会使得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正式拉开帷幕，黄晓晨、胡继华、王炳均、王炎等多位学者围绕文化记忆理论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王霄冰、康澄、燕海鸣、冯亚琳等人也尝试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剖析，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和应用呈现多学科交叉之势。当前，与文化记忆理论相关的著作有：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005）、王雷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2007）、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009）、扬振之《风景的文化记忆》（2009），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201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2013）、陈新《历史与思想第一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2014）、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2015）等，整体来看数量不多且理论研究不够系统、完善，大部分学者是将文化记忆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对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历史现实等具体事物的阐释，缺乏对理论本体的深入探究。

通过 CNKI 总库对“文化记忆理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检索到学术期刊文献 97 篇，硕士学位论文 77 篇，博士学位论文 12 篇，总体而言，国内对于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本体性研究。一些学者关注文化记忆理论本身，力图通过文章译介、理论的再阐释实现对理论本体研究的深入。王霄冰在《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07）中提出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角度，即从以文本和记忆为载体的文化记忆视角进行解读。王建《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学术与探索，2012）一文着重对扬·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本土化发展现状进行反思。二是对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探究。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文化记忆则是宏大历史叙事中构建起民族与记忆关系的重要理论。衣俊卿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中力图建立历史体验和思想理论之间的联系，并提出“精神史研究范式”。马建青《记忆深处的历史——

兼论“精神史研究范式”的意义》(学术交流, 2017)则在文章对这一记忆与历史叙事联系的重要范式进行论述,并充分肯定了记忆对于历史体验和历史叙事的重要意义。三是文化记忆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文化记忆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呈现,更是构建文化身份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赵静蓉在《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三联书店, 2015)中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记忆、历史、现代人的焦虑及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探究,并以帕慕克《纯真博物馆》和村上春树《挪威森林》为例对认同与记忆展开具体分析。左路平、吴学琴在《论文化记忆与文化自信》(思想教育研究, 2017)一文中对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进行阐释,历史语境下民族记忆的延续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刘振怡在《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学术交流, 2017)、叶蔚春《文化记忆:从创伤到认同》(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8)等均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四是关于符号与文化记忆关系的探究。文化仪式、文学作品、传播媒介等作为文化符号都具有记忆承载的功能,例如陶东风的《“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文艺研究, 2011)、冯亚琳的《记忆的构建与选择——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格拉斯小说》(外国文学, 2008)、王伟平的《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功能》(新闻战线, 2010)等都说明了文化符号对于传递和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性。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关于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记忆的研究领域,对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边界拓展、跨学科融合研究具有推动作用。但当前也存在研究不够系统和完善的问题,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以理论对其他客观事物的分析阐释,对理论本体的把握和探究有待加深。结合国内当前实际,从文化记忆出发,如何发挥其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梳理文化自信等实际社会功用价值这一现实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对于记忆理论的研究起步更早且更为完善和成熟,文化记忆研究大致遵循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再到文化记忆这一发展脉络,与之相关的研究与国内研究方向类似但也略有差别,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扬·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本体及其他记忆概念的研究。阿斯特莉特·埃尔在《文化记忆研究:国际跨学科手册》(《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2008)中明确将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归属为

社会群体记忆，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则是生物体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在《重塑记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2012)中从个体记忆、社会记忆、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四个角度对记忆进行分区。二是考察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阿兰·梅吉尔在《记忆与历史》(2005)中认识到记忆与历史的联系，提出要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阿莱达·阿斯曼在《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转换》(2008)中肯定了记忆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正确认识并运用二者的相互作用。三是文化记忆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关系的考察中，国外学者关注到了创伤体验和心理问题，例如丹尼尔·德罗兹泽夫斯基，艾玛·沃特顿香提·苏马尔托霍在《战争背景下的文化记忆和身份：经验、基于地点和政治的关注》(《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war: Experiential, place-based and political concerns》，2019)和安德烈亚斯·汉堡的《创伤、信任与记忆：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和文化记忆中的社会创伤与和解》(《Trauma, trust, and memory: Social trauma and reconciliation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therapy, and cultural memory》，2020)基于战争、创伤等给个体带来的心理、精神体验，以此探究个体经验与文化记忆间的复杂关系。四是文化载体与文化、记忆的关系研究。例如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1989)、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2003)关注到仪式、文学作品、公共建筑等具有记忆功能的载体媒介在记忆内容选择和记忆延续方面的重要性。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化记忆在内容表达和形式选择上更加多元化，文化记忆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国外文化记忆相关研究的方向与国内研究大致相同，存在相似之处，对理论实践应用的较多关注也导致对理论本体的研究深度不足，二者在理论实践层面的研究具有同向性，但实践内容的选择上具有差异性。

## 二、生育书写研究

生育，又称“生产”“分娩”，是指女性在经历两性关系、受孕等过程后从体内将婴儿产出的行为。生育不仅包括正常的生产，还包括小产（流产）的特殊情况，以及产后抚育、教养等一系列行为。广义的生育书写是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生育行为的集中描写，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生育书写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生育书写的文学史分期研究；二是重大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集中书写研究；三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生育书写研究实践。

### （一）生育书写的文学史分期研究

生育观念和生育方式等与当时的政治政策、经济方式、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关系，作家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生育现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学者又将目光着眼于不同历史分期的生育书写研究，为纵向维度上把握生育书写的整体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朱国宏《生育文化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对中国古代传统生育文化、建国后以及七八十年代以后的生育文明进行阐释，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呈现出生育文化的变化历程。刘艳琳的《孕育体验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书写》（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4期）基于对生命的思考和女性的独特体验，对作为“生育之性”的女性的生育痛苦进行阐释。马云在《男性叙事话语中的孕妇情境——铁凝小说〈孕妇和牛〉引起的话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在男性群体的凝视下对女性生育文化做出了新的价值评价，并由此对中国女性生育主导权的长期弱势地位进行阐发。总的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生育书写内容带有一定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关于生育书写的研究中“计划生育”成为了高频词汇。

## （二）重大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集中书写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以“抽刀断水”的决绝姿态在国内实行，同样也对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80年代末纯文学的审美标准使得对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书写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呈现出该题材的现实关注度与文学表现体量的错位。进入新世纪后，“重返现实主义”成为时代的召唤和要求，计划生育才成为被广泛书写的文学素材。据现有资料考究，作品中对计划问题有所涉及的长篇小说主要有伍开元的《十月怀胎》（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莫言的《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郑小驴的《西洲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阿良的《计生办主任》（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5期）等。

莫言的小说《蛙》作为计划生育题材的代表性作品，是学界和评论界对计划生育问题研究的中心所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内容大都集中在具体人物形象、叙事艺术及技巧以及历史政策客观再现三大方面。因为本论文关注生育书写，对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不再细致叙述，主要围绕历史政策的客观再现（即关于《蛙》计划生育书写）展开研究，对此集中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问题背后的生育伦理困境。二是生育政策下对生命意识、生命哲学的持续关注。总体来看，计划生育这一宏大现实主体的小说创作体量并不大，且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学术研究数量不多，尚未形成系统性、专题性研究，呈现出分散性、不平衡性的特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38014122010007005>